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5.008

# 共鸣与成长:申京淑小说《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中的创伤叙事<sup>①</sup>

崔昌笏<sup>1</sup>,凌云<sup>2</sup>

(1.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扬州市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申京淑的长篇小说《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以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斗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创伤与内在成长历程。身处成长礼仪中的主人公们饱受缺失之痛,尽管努力寻找摆脱痛苦的方法,却又陷入缺失链的重重束缚中。为探索“成人礼”的出口,他们由互相依靠走向独立,由爱的客体转化为主体,并最终构建出独立完整的主体自我意识。小说充斥着浓重的哀伤氛围与凝重感,突出刻画了缺失造成的精神创伤,强调心灵共鸣的重要性和成长的永恒价值。

**关键词:**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共鸣;成长;创伤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048-05

申京淑是当代韩国文坛备受关注的女作家。《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以下简称《电话铃声》)以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为背景,讲述了郑允、丹、美芦和明瑞四个年轻人的成长故事。“后日谈小说”<sup>①</sup>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经昙花一现,作者以民主化运动一代的经历为题材,再度创作“后日谈小说”,在21世纪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此中必有深意。因而,深入剖析这部小说的主题意蕴,有望揭开申京淑作品的创作动机及其文学精神的根源所在。

## 一 “成人礼”与缺失链

《电话铃声》的主人公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处境,他们各自经历着独特的心路历程,要去完成从想象域渡到象征域的成人礼,即要完成主体“从一境地到另一境地”,由社会非成熟期走向社会成熟期的“过渡礼仪(Rites de Passage)”<sup>②</sup>。他们的成长极度艰辛,尤其是要以严重的缺失情结为代价。这些年轻

人身上都烙印着各不相同的缺失印记,他们以缺失为成长的动力,而成长的历程又因缺失而受阻。

在小说中,缺失同时产生丧失感和期待感。丧失感来源于已经不复存在的事物,这种曾经的存在对于主体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而期待感产生于对所缺事物的渴望,因为有些东西虽然缺失,但仍有望出现<sup>③</sup>。这种对下一个镜像——欲望小他者的期待成为了年轻人的成长动力。小说人物在经受一种缺失时,期待和寻求能够弥补这一缺失的新的精神寄托。如郑允失去妈妈后对丹、美芦和明瑞的情感依赖与期望,美芦失去姐姐后对姐姐的恋人及尹教授的找寻与向往等,这些期待成为主体新的成长动力,他们由此重获从想象域走向象征域的勇气,努力寻求两者间的平衡。郑允安慰美芦,姐姐的死并不是她的错,试图劝导美芦走出阴影,并与美芦一同去寻找姐姐美莱失踪了的恋人,为的是能够帮助美芦尽快回归正常生活。郑允期待美芦走向理想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暗含着连同自己回归正常生活的期望,正是这种期望促使郑允逐

① 收稿日期:2018-03-19

基金项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教研重点基地”项目(AKS-2013-0LU-2250003)

作者简介:崔昌笏(1971-),男,吉林舒兰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韩国文学研究。

①“后日谈小说”专指以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属于反思文学,主要回顾和反思在反军事独裁、争取民主化的运动中年轻一代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曾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韩国文坛。

②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页。

③李在荣:《丧失的世界和世界的丧失——论申京淑》,《创作与批评》2001年第4期。

步走出失去母亲的悲伤,直面现实社会。同样地,丹抱着成为画家的期望进入大学,又抱着成为优秀军人的期望进入军队,并期待着郑允能够接受自己的爱,正是这些期望,才使他有勇气尝试完成从想象域到象征域的转换。

另一方面,四个年轻人的命运走不出被诅咒般的怪圈,即他们陷在从一种缺失到另一种缺失的缺失链当中,他们对下一个镜像的期待感反而造成了新的丧失感。正如拉康所言,欲望永远处在到达之外的地方,“欲望的溪流是作为能指连环的变迁而流动的”<sup>①</sup>,欲望永远在他者那里。寄托在他者身上的欲望,永远不可能实现,反而使他们原有的期待感沦为了另一种缺失与痛苦。缺失链的形成对主体造成无形而巨大的成长阻力,使得主人公们在想象域和象征域之间反复游离,最终迷失甚至毁灭自我。美芦和丹正是因一个个精神寄托的破灭而拒绝走入成人世界,或者说是拒绝社会化,并最终走向死亡。

美芦为了弥补失去姐姐的缺失感,决心去寻找姐姐的恋人。姐姐美莱的恋人因参加民主化运动而被当局带走,之后杳无音讯,姐姐为寻找他四处奔波,最终绝望的她以自焚来抗拒独裁政权。为了寻找姐姐的恋人,美芦不断回忆曾经的细节,这反而加深了她对姐姐的负罪感。而且在寻找过程中,美芦越来越靠近姐姐的恋人已经死亡了的事实,从而陷入失去姐姐以及姐姐恋人的双重缺失中不能自拔。此后,美芦唯一的期望是能够和郑允、明瑞等好友生活在一起,但是供他们居住的小屋却被父母强行卖掉,象征域的暴力介入使美芦的精神寄托又一次破灭了。她只得躲入外婆留在偏僻乡下的小屋中,断绝所有与外界来往,逃避一切社会秩序,拒绝象征符号体系的侵入。然而与世隔离的她,由于他者的缺席,无法建构完整的主体性,内在混乱导致厌食症加剧,美芦最终在乡下小屋里独自死去,她的青春也永远停留在了想象域的此岸。

丹进入大学后,原本要成为画家的期待渐渐被动荡的社会现实所湮没;而军队生活中毫无人性的黑暗面使他原本要成为优秀军人的理想也不复存在。自此,他仅存的希冀是郑允能够接受他的爱情,然而郑允的拒绝使他再次陷入绝望。他的期待得不到欲望他者的呼应,期望渐渐成为无法实现的幻影,一个个精神寄托的幻灭导致他迷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尽管军队主张丹死于事

故,但其死亡非常蹊跷,离奇的死亡也使丹永远止步于象征域之外。

美芦和丹的悲惨命运说明了他们在成人礼中始终沉迷在各自的想象域当中,无法摆脱缺失链的束缚,最终死于内心的冰点。可以说在申京淑笔下,小说人物经受着源自缺失的各种不安的侵袭,“尽管缺失是人类存在本身不可避免的,然而像申京淑这样执着、甚至近乎强迫式地体现缺失意识的作家很少见”<sup>②</sup>。主人公们努力寻求摆脱缺失之痛的途径,但却始终陷在一种怪圈中,由一种缺失转向另一种缺失,被环环相扣的缺失链束缚折磨。

## 二 死亡的内化与精神创伤

死亡是不可挽回的“绝对的缺失”,它无法通过情感转移或者新的期待感的产生来消解,因而造成了成长主体和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电话铃声》中,郑允因妈妈的逝世而迷失人生的方向,美莱因恋人的失踪选择自焚,美芦因姐姐的离去失去人生的榜样,而后来美芦和丹的相继死亡,又给明瑞和郑允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打击。

小说中的死亡大部分是由年轻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边缘化所造成的,是一种逐渐逝去的他者之死<sup>③</sup>。同时,年轻的主人公们将他者的死亡当作自身的死亡来体验,使他们置身于与世隔绝而近乎自闭的状态,这种绝对的缺失成为成长过程中巨大的阻力。姐姐原本是美芦人生的榜样,她的死亡象征美芦欲望大他者的缺席。美芦曾经两度因姐姐产生缺失感和负罪感,最初是在儿时,由于不小心弄伤了姐姐的腿,致使姐姐再也无法跳舞,而倾倒在姐姐天鹅般舞姿的美芦,儿时曾梦想像姐姐那样优美地跳芭蕾舞。因腿部受伤无法继续跳舞的姐姐虽一度消沉,但遇上心爱的人之后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和活力。姐姐身上散发出的光芒,再度成为美芦心目中的榜样。然而当姐姐追随自己的恋人,为抵抗军事独裁而死时,美芦的梦想再度幻灭,也彻底失去了自身的欲望大他者。当姐姐要自焚时,为了拦阻姐姐,美芦的手上留下了可怕的火烧伤疤,内心深处更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美芦在平时一直藏着烧伤的手,拒绝与外界接触,姐姐的死亡终究成为其想象域和象征域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①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2页。

②金贞雅:《申京淑小说中的死亡——1990年代女性小说中的一种死亡类型》,《批评文学》2007年第1期。

③金银河:《1990年代女性小说的三种类型——以申京淑、殷熙耕、孔善玉的小说为中心》,《创作与批评》1999年第4期。

小说并没有回避时代境况,反而如实地反映出军事独裁时期的社会暴力给年轻一代带来的创伤。郑允无意中卷进示威游行队伍中,遭遇军警的镇压,感到无助和恐惧;美莱的恋人被当局抓捕暗杀,而美莱为了抗拒和告发军事独裁政权选择自焚;丹在军队中经受着上级对下级的虐待,在军队这一封闭系统中感到无助和不可抗拒。不过,比起外在的社会因素,作家更加着力于刻画心灵内在的成长和交互。正如申京淑自己提到,“尽可能地抹去时代的痕迹,阻止现代文明事物的介入,剔除非心灵的沟通手段,以便让郑允、丹、美芦和明瑞四个年轻人的青春主要表现在行走、阅读和写作等事务上”<sup>①</sup>。小说中的民主化运动、军事独裁等社会因素只是起到远景式背景的作用,并没有直接主宰和控制人物命运和人物的内在成长。

年轻的主人公们之所以痛苦、不安、彷徨,并不直接源自外在的社会因素,而是对自身欲望的无法企及和对他者的不在场做出的反应。他者的缺失原本就是抽象的范畴,发生在人们追寻欲望的过程中。自身欲望的所指和其心理伤痕的具体根源所在是模糊的,虽然主人公们都渴望在象征域中构建理想的自我,但是他们所渴求的理想自我本身就是一种模糊的形象。就像郑允和明瑞都希望不要忘记“此时此刻”的经历,但是对于自己应以何种姿态走向未来却感到迷惘,“没有经历过的未来,谁又能预测呢?”<sup>②</sup>对他们来说,唯有死亡是可感知的真实存在,亦是不可能复原的永久性缺失。

小说淡化外因的影响,使他者的死亡内化为主人公各自的精神创伤。例如,美莱和她的恋人的死亡在美芦眼中绝非是过去,而是成为在现实生活中她与他人以及世界相连接的屏障。美芦通过回忆和寻找,将逝者生前的生活样貌一一复原,她将姐姐和姐姐恋人的死亡内化为自己永不愈合的精神创伤,时刻舔舐伤口,折磨自己脆弱敏感的心灵。社会因素的淡化和死亡的内化更加突出和强化了缺失及其造成的精神创伤,小说强调的是一代人心灵内在的挣扎和成长,而不是意识形态、社会事件等对成长造成的影响,为此小说尽可能剔除了外在因素对成长的干扰。作者关注的是暴露在想象域暴力之下灵魂的殊死抗争,因为只有这种抗争才能够真正体现出主体对外在意义的拒绝和对真实自我的不懈追求。小说通过描画那些

无法再生或者正在不断消逝的事物和人们,加深了读者对缺失之痛的切身感触,让读者切实感受到精神创伤下人们的忧郁和悲伤,引导人们通过心灵的交互与共鸣来战胜这一切。

### 三 心灵共鸣与主体构建

处在青春期的主人公们即使身处悲剧的时代,依然不可能直接跨过需要经历的成长礼仪的具体进程。如何面对成长的艰辛、如何担负起时代的重任、如何抚慰缺失造成的精神创伤,他们需要在摸索中找到答案。这群年轻人试图通过对彼此心灵的召唤,达成心灵上的内在交互与共鸣,并以此承担彼此的生命重量。他们期盼共同成长,寻求找到到达青春彼岸的途径。他们之间的心灵交互以共同感受的缺失及其造成的精神创伤为基础,他们彼此间互为镜面,通过对方体验着自己成长历程中的缺失和创伤,因而更能感受和理解对方的伤痛,为靠近和呼唤彼此的心灵提供可能。借助镜面的作用建立内在世界(Innenwelt)与外在世界(Umwelt)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拉康意义上的镜像阶段的典型特征<sup>③</sup>。

美芦和郑允互为镜面,她们通过对方的伤痕来体验自己的缺失创伤,进行心灵的交流和沟通。尤其是在丹和郑允、明瑞、美芦一起居住的日子里,他们彼此建立镜面关系,达到心灵上的强烈共鸣,纯净的友爱和温情让他们互相依靠和扶持。而在丹和美芦相继死去后,剩下的郑允和明瑞也正是依靠这一份心灵上的共鸣,以及互相支撑才走出绝望。看到对方沉溺在亲密好友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中,生活秩序变得一团糟,郑允和明瑞都替对方深感痛惜,彼此都希望抵达对方的心灵深处,寻求心灵交互的窗口,抚平对方的内在伤痕。然而,仅以互相依靠来承担生命重量是不够的,作为镜像的自我是一种幻象,镜像作为主体并不完整,更不可能抵达真实的自我。自我必须从受到他人关爱的对象和客体地位转换到能够去关爱他人和独立面世的主体地位,才能够构建独立完整的人格和主体性。

这正如明瑞对郑允所说,“如果我们在一起,你和我都会很痛苦,很悲惨”,“我会把你从人群中孤立出来,让你变成孤岛,让你与世隔绝。只有通过我,人们才能知道你。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牵绊。如果我总是不想和你分开,最后我们两个

①申京淑:《作家的话》,载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7页。引文均由笔者自译。

②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③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2页。

都会很惨”<sup>①</sup>。心灵的交互与成长并不是互相霸占,而是让对方在拥有独立人格的前提下成长。尹教授安慰郑允的方式就是一种提示。尹教授在得知丹的死讯后,并没有用言语来安慰郑允,只是让她帮忙拍打松树上的积雪,以便让树枝不为积雪的压力所折断,这反而使郑允找到内心的平静。另一方面,尽管尹教授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来感染年轻一代,引导他们思考人生,但仅靠尹教授的影响力不可能使这些年轻人完成成人礼。因为要想抚平伤痕需要主体自身的努力,完成成人礼的过程同样需要主体自身的成长,主体的自身构建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要担负起他人和世界的重量,就需要主体自身的内在成长,使自己成为坚强的克利斯朵夫<sup>②</sup>,拥有呼唤他人的力量,这也许正是尹教授所讲的克利斯朵夫典故的寓意所在。尹教授留下遗言说:“我的克利斯朵夫们,谢谢你们陪伴我。不要悲伤。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青春、痛苦、激情、空虚、战争、暴力都不例外。花开花落。我也发生过了,所以要消灭。看天空,那里有星星。不管我们是否在看,不管我们是生是死,星星依然在那里闪烁。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星星。”<sup>③</sup>遭受磨难之后,明瑞独自离开,相爱的两个年轻人分手,但这迫使郑允和明瑞面对各自的人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生活,直面现实社会,独自承担责任与痛苦。两个人分开后,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有承担生命重量的勇气与能力,要通过自身的成长来克服对世界的恐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而且只有一次。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走入另外的世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去悲伤,也以自己的方式失去靠近死亡的人。”<sup>④</sup>八年后,郑允最终成为作家,走上周末讲堂给学生上课;明瑞成为一名摄影师,背着背包辗转于世界各地,拍摄各国年轻人相互拥抱的照片。在接受采访时,明瑞回答道:“我有时会因为某种试图摧毁自己的冲动而痛苦,正是年轻人互相拥抱的情景帮我战胜了这种冲动。”<sup>⑤</sup>年轻人的互相拥抱勾起人们对世上美好一面的向往和信任,令人们感受到心灵之间纯真的交流和沟通,并从中慰藉自己的灵魂,鼓起勇气承担自身和世界的重量。

#### 四 凝重感与未完的成长

作为创伤叙事,小说通篇充斥着一种哀伤氛围和凝重感。“申京淑总是带有一种悲剧意识,似乎她想表达的悲伤之情越是浓重,想冲破这种悲伤束缚的意志就越加强烈。”<sup>⑥</sup>小说的主人公们被一种莫名的悲伤包围着,尽管他们相互依靠,努力度过这段艰难的成长过程,但是不安总是萦绕心头,死亡气息次第而至,悲伤挥之不去,离别无法避免。小说中美莱的自焚身亡、丹在事故中的死亡、美芦因厌食症的死亡都深深加重了小说的哀伤感。郑允和明瑞面对亲友的相继死亡,凭借对彼此的依靠渡过了那段最煎熬的日子,但相爱的两人终究还是分手了。生离死别是一种永恒的缺失,强化了小说的哀伤氛围与凝重感,而这种凝重感又是人们不断反思和叩问成长和死亡本质意义的情感基础。

小说以郑允为叙事者,在历经漫长岁月之后,重新通过她的回忆再现和反思过去,不断反刍和舔舐在青春岁月所经受的内在伤口,并复原其伤痕的由来,加深小说的哀伤氛围与凝重感,向人们展现了人的内在心灵在象征域暴力面前漂泊无依的情状。作者通过还原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缺失之痛、不安彷徨、悲伤孤独,强化了精神创伤的真实感,并希望人们反省心灵故乡日渐消亡的现实。同时,作者透过小说中的凝重感呈现出某些瞬间里的永恒真实,力图寻求和认同成长的意义以及潜藏在成长过程中的希望和价值,这无疑是申京淑小说深邃的文学内涵和可贵的文学精神的所在。

首先,作者通过对生活真实的执着探索和“未完的成长”理念,突出了成长的意义和价值。无论人的年龄如何增长,社会世态如何变迁,作者都希望人们不要停止“成长”,不要忘却创伤的记忆,将痛苦和灵魂的挣扎转化为继续成长和前行的不竭动力,不要放弃曾经在青春岁月中探索“真实性”的精神和对希望的执著追求。郑允身上充分体现出了勇于探索“真实性”的不懈精神,八年后的她仍然锲而不舍地调查丹死亡的真相,不放弃追求真实。这种追求不仅仅是探索外在事实,更是在探寻生命和死亡的意义。在小说的尾声中,尽管明瑞仍然在回避郑允,但是郑允在“褐

①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②“克利斯朵夫”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圣者,力大无穷的他决心为人世间最强大、最伟大的人服务。后来他背负化身小孩的耶稣过河,体悟到全世界的重负,终于接受耶稣的召唤。

③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④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⑤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⑥林奎灿:《对青春的共鸣和怜悯的人学——申京淑长篇小说〈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创作与批评》2010年第3期。

色笔记”上写道:“我,去,找,你。”<sup>①</sup>这意味着曾经的缺失无论留下怎样不堪回首的伤口,女主人公依然选择踏着悲伤走向爱情,依旧肯定心灵交互与内在共鸣的美好价值。在伤痛面前不再踌躇,投身于心灵未曾停步的永恒的内在成长当中,才是一种希望。

其次,作者期望人与人之间心灵的共鸣能够跨越时空得以传承下去。申京淑谈到,“经过人生某个阶段的时候,总有存在的充盈和缺席、无法安慰的不安和孤独的瞬间如约而至,我希望这部小说能成为抚摸这些瞬间的手,成为人们渴望抓住的手”<sup>②</sup>。可见,申京淑捕获到了在生活的某些瞬间里呈现的永恒真实,让人们感悟和共享其中的价值。作者在21世纪的语境下重提民主化运动一代人痛苦的成长经历,是希望与下一代人进行对话,引导现今的年轻人产生心灵内在的共鸣。即使时代在转换,但有些永恒的东西是不管哪一代人都要共享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对真实和内在成长的追求以及对外在世界的抗争。因为只有经历缺失、精神创伤和灵魂的殊死挣扎,才会不断去探索真实的自我,敬畏生命的重量。

### 结语

申京淑《电话铃声》的核心因素是年轻一代所经受的精神创伤以及他们之间的心灵交互与内在成长。虽然处在青春期的主人公们可能走向自

我毁灭和死亡,但是成长的步伐依然要向前迈进,通过成人礼渡到青春的彼岸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人生课题。当他们由互相依靠走向独立,由爱的客体转换为爱的主体,并构建独立完整的主体自我意识,完成内在成长与彼此间的共鸣时,才能够战胜来自现实社会象征域的阴霾。

杨金才曾指出:“新世纪外国文坛上不断涌现出很有探索意味的作品,它们对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理病症的解剖,不仅进一步思考伦理关系,而且使社会情感关系复杂化,从而彰显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对现实的穿透力和批判性,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加以辩证思考,确切地领悟作家作品中人性的精神穿透力与批判性。”<sup>③</sup>申京淑通过再现和反思过去,哀悼逝去了的年轻生命,反刍死亡、缺失、丧失所带来的痛苦,并将成长当做未完的课题,希图与新一代人遥相呼应。不屈服于象征域的外在价值体系,不断探索自我,青春与成长的价值并不因年龄和时代的变换而褪色,这是经历过成人礼的每一代人共同的财富。作者期望人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对成长的追求、不要放弃对真我的执着,尤其要与磨灭主体真实性的外在暴力相抗衡,勇于担负起那一份生命的重量。这正是小说深层的主题意蕴和申京淑文学精神的根源所在,亦是21世纪韩国文学呈现出的横跨两个世纪的精神穿透力与价值所在。

## Resonance and Growth: On the Traumatic Narrative of Shin Kyung-sook's *From Where Comes the Ring Tone for Me*

CHOE Chang-ruk<sup>1</sup> & LING Yun<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Foreign Affairs Office, Yangzhou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Set in the South Korea's Democratization Struggle in the 1980s, Shin Kyung-sook's novel *From Where Comes the Ring Tone for Me* describes the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inner growth processes of the contemporary Korean youth. The heroes in growth etiquette were suffering from the pain of lack, despite of their attempt to find a way out of suffering, and were lost in the chains of lack. To explore the way out of "adult etiquette", they learned to be independent instead of relying on each other, transformed themselves from a love object into a subject, and ultimately, constructed the integrate self-consciousness. The novel was filled with a tone of grief and heaviness. It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ul resonance and the value of the eternal growth through highlighting the trauma caused by lack.

**Key words:** Shin Kyung-sook; *From Where Comes the Ring Tone for Me*; resonance; growth; trauma narrative (责任校对 刘兰霞)

①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②申京淑:《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文学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③杨金才:《关于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